

# 同盟凝聚力、盟国干预与楔子战略下 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

邢 茜

**[内容摘要]** 文章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当分化者使用楔子战略去分化对手联盟时,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本文提出分化对象所处同盟凝聚力的高低影响着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同盟凝聚力的高低主要受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和威胁一致度影响。当分化对象处于松散型同盟时,盟国的干预会决定其选择,如果盟国的干预力度强于分化者的影响力,分化对象会选择维持原同盟关系,反之,背叛原同盟。当分化对象处于紧密型同盟时,楔子战略一般不会使分化对象背叛原同盟,但当分化者在同盟的紧密度出现下降的趋势时使用楔子战略,分化对象与盟国的关系将会被削弱,此时就需要盟国强干预。文章通过四个案例对以上假设进行论证。

**[关键词]** 楔子战略 分化对象 同盟凝聚力 盟国干预

**[作者简介]** 邢芮,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 一、引言

在国际关系中,分化敌对同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同盟的形成被视为一种楔子战略。<sup>①</sup>回顾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发现多个国家都曾经通过使用楔子战略来达到分化对手同盟的目的。比如,德国就曾多次利用楔子战略,成功阻止了敌对同盟的

<sup>①</sup> Timothy W.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pp. 1~38.

形成。苏联也曾通过楔子战略,成功分化了日德同盟。时至今日,一国如果想达到分化敌对同盟或同盟预阻的目的,楔子战略仍是其首选战略。比如,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就多次交叉使用报偿式楔子和强压式楔子战略<sup>①</sup>,试图挑拨、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还试图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以离间中俄关系。那么,分化对象面对楔子战略时的选择有哪些?这些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从理论层面来看,已有的关于楔子战略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楔子战略的实施者,即分化者的角度出发,系统回答了分化者在对分化对象实施楔子战略时有哪些具体的策略手段这一问题。但在楔子战略中,分化对象具有能动性,需要学界关注。当分化者使用楔子战略去分化对手同盟时,分化对象国的战略选择有哪些?是接受分化还是拒绝分化?其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自由度是否有所不同?从分化对象的角度切入来研究楔子战略,可以帮助我们对楔子战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理解。

从现实层面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将中国视为其竞争对手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美国多次使用楔子战略来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无疑给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西方国家对此感到强烈不安和担忧,无论是从话语还是从行动上,都在试图挑拨中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策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厘清分化对象的行为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为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楔子战略时制定出合适的反楔子战略提供一些政策参考。

本文分为五部分。除本部分外,第二部分主要为文献回顾,并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是对本文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概念界定,并做出理论假设。第四部分是通过案例来验证假设。第五部分为结论。

---

<sup>①</sup> 有关报偿式楔子和强压式楔子,可参见钟振明:《报偿分化、强压分化及联盟政治中的楔子战略选择》,《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20~29页。

## 二、文献综述

楔子战略是一种旨在分化敌对同盟或阻止潜在敌对同盟形成的中层战略理论。<sup>①</sup>当分化者对分化对象采取楔子战略时,分化对象会进行战略回应。已有研究认为,分化对象的战略回应包括接受楔子、拒绝楔子、亦或是在分化者和同盟国之间摇摆。既有研究分别从国家间层次、国内层次,以及跨层次分析视角,对分化对象的战略回应进行分析。

### (一) 国家间层次分析

在该视角下,学者们认为分化对象在面对楔子战略时,会基于其联盟关系来做出战略回应。具体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联盟凝聚力和联盟种类两个角度切入。从联盟凝聚力角度来看,所处联盟凝聚力的高低会决定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分化对象在面对楔子战略时,如果所处联盟凝聚力高,其会选择拒绝分化,维持原同盟关系。格伦·斯奈德认为,在战争情况下,凝聚力高的联盟将更有效地战斗,同时他们也不容易受到对手以分化他们为目的而实施的楔子战略的影响。<sup>②</sup> 埃文·雷克斯尼克提出了判断战时联盟凝聚力高低的指标,包括联盟成员战争目标的重叠程度、军事协调程度,以及共享战争资源的程度。<sup>③</sup> 亚历克斯·韦西格则注意到,在战争状态下,当分化对象与同盟国不在同一战线上作战时,更容易受到楔子战略的影响,选择放弃原同盟关系。<sup>④</sup> 从联盟种类角度来看,依据联盟内部成员实力地位的大小和承担责任的多少,可将联盟划分为对称联盟与不对称

---

① 有关楔子战略的定义可参见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55 ~ 189; 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当代亚太》2016年第1期,第4~29页。

②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 ~ 49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55 ~ 189.

③ Evan N Resnick, “Hang Together or Hang Separately? Evaluating Rival Theories of Wartime Alliance Cohes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4, 2013, pp. 672 ~ 706.

④ Alex Weisiger, “Exiting the Coalition: When Do States Abandon Coalition Partners during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0, No. 4, 2016, pp. 753 ~ 765.

联盟。<sup>①</sup> 学者们认为,当分化对象处于不对称联盟且属于较弱一方时,在面对楔子战略时会选择接受楔子。<sup>②</sup>

## (二) 国内层次分析

在该视角下,学者们认为分化对象在面对楔子战略时,会受到国家利益、政权更迭的影响。首先,分化对象面对楔子战略时,会依据本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诉求来进行回应。崔佑善、朱陆民等学者认为,1949 年到 1950 年间,中国拒绝接受美国的楔子并选择与苏联结盟,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sup>③</sup> 凌胜利则在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拉美国家使用楔子战略时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也是影响分化对象选择的重要因素。<sup>④</sup> 韩召颖、黄钊龙则跳出西方实践,以秦惠王成功分化齐楚联盟为例,认为在秦国的利诱面前,楚国最终彻底断绝了与齐国的同盟关系。<sup>⑤</sup> 其次,国内政权的更迭也会影响分化对象的战略回应。沙迪·曼苏尔在对沙特使用楔子战略分化叙利亚和伊朗关系进行分析时,也提到叙利亚的国内政权会影响其对沙特楔子战略的回应。<sup>⑥</sup>

## (三) 跨层次分析

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一视角的分析往往缺乏解释力。凌胜利从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单元层面的战略目标和联盟关系对楔子战略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sup>⑦</sup> 在凌胜利的分析框架基础上,连波以印度为例,对分化对象战略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论述。<sup>⑧</sup> 王晓虎在探讨美国对东盟楔子战略的案例时认为,

① 杨鲁慧、赵伟宁:《韩美不对称同盟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第 10~18 页。

② 王晓虎:《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国际展望》2017 年第 3 期,第 58~77 页。

③ Wooseon Choi, "Structural Realism and Dulles's China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2, pp. 119~140; 朱陆民、翦丹:《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从预阻到分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102~112 页。

④ 凌胜利:《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的楔子战略影响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05~120 页;凌胜利:《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楔子战略”》,《拉丁美洲研究》2015 年 3 期,第 48~53 页。

⑤ 韩召颖、黄钊龙:《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62~72 页。

⑥ 参见 Shady A. Mansour, "The Wedge Strategy: How Saudi Arabia is Attempting to Influence the Syrian Conflict," in Dania K. Khatib, ed., *The Syrian Crisis: Effects on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21, pp. 49~67.

⑦ 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7 期,第 68~89 页。

⑧ 连波:《摇晃的“楔子”: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印度战略行为探析》,《南亚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国内层次上东盟国家利益的考量与菲律宾国内政府更替,加上外部层次上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积极互动,共同影响了东盟的战略回应。<sup>①</sup>在分析萨德入韩问题时,凌胜利也提到了除了美国的压力外,韩国的战略回应还受到韩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sup>②</sup>

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分化对象的战略回应提供了多样的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无论是国家间层次还是国内层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都忽视了体系变量,落入了个体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战略环境对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楔子战略下的分化对象处在一个既关键又敏感的位置,仅从单一视角讨论问题解释力略显不足。其次,跨层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体系与单元割裂的问题。但既有的研究大多是对单一案例的分析,理论框架的普遍性意义尚不明确。再次,无论是单一视角还是多视角分析,学者们都是以分化者为出发点,通过研究分化者使用楔子战略的类型来间接推导出分化对象进行战略回应时的行为逻辑,这样的研究往往会忽视分化对象在面对楔子战略时的主动性与动态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以分化对象为中心,运用过程追踪法,将多个案例纳入考量,从而揭示分化对象在楔子战略下的一般性行为逻辑。

### 三、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当分化者使用楔子战略时,分化对象看似有多种选择,但其战略选择的自由度会受到所处体系类型的影响。而当在分化对象需要作出二选一的选择时,其所处同盟的凝聚力高低将成为其行动的关键影响因素。

#### (一) 关于楔子战略的概念界定

蒂莫西·克劳福德最初指出:“分化敌对联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的形成被

---

① 王晓虎:《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第58~77页。

② 凌胜利:《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5期,第46~57页。

认为是一种楔子战略的运用。”<sup>①</sup>随后,国内外学者们对此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凌胜利从多个角度入手对楔子战略的定义作出了详细阐述,他指出,楔子战略是指“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同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同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试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sup>②</sup>韩召颖从目的入手,将楔子战略定义为“分化者出于改变相对实力对比的目的,寻求对潜在或既有敌对同盟进行分化的一切努力”。<sup>③</sup>

在既有定义的基础上,本文还想补充两点说明。第一,在相互关系上,分化者在实行楔子战略时,面对的情况往往是分化对象与分化者的敌对国是正式的同盟关系或潜在的盟友关系。正式的同盟关系是指两个国家基于共同的目标而做出的基于条约的正式安全安排。<sup>④</sup>相比于正式的盟友关系,潜在的盟友关系在权威性、法律效力,以及双方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方面较为有限。但不可忽视的是,潜在的盟友关系也是在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的,且双方之间对合作的探索仍在继续。因此,以下笔者将潜在的同盟关系也类比为同盟。综上,在楔子战略下,分化对象与分化者的敌对国是两个具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分化者的最终目的是恶化分化对象与分化者的敌对国的关系。第二,在手段选择上,分化者在运用楔子战略时往往会有放矢。分化者在实施楔子战略前会对分化对象与分化者的敌对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找到二者的分歧点,或者是分化对象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并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楔子。在提出假设和选择案例之前,明确上述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 (二) 分化对象战略选择的自由度

面对楔子战略,分化对象有三种选择:接受分化、拒绝分化,以及在分化者与分

① Timothy W.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 ~ 41,”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pp. 1 ~ 38

② 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当代亚太》2016年第1期,第24 ~ 29页。

③ 韩召颖、黄钊龙:《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62 ~ 72页。

④ Bemshima Saka and Muhammad Abdullahi, “Allicance and Coaliti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US-South Korea,” *Zamfar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Vol. 2, No. 2, 2021, pp. 1 ~ 11.

化者的敌对国之间摇摆。但在实际操作中,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自由度因所处的不同体系类型而异。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国家行为也随之改变。<sup>①</sup>

本文考察的国际体系类型主要分为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两极体系不给外围大国留下任何空间,形成了两个明显把对方标记为“共同敌人”、不断施加压力、不使用武力的大国集团。<sup>②</sup>在两极体系下,通常是霸权国对一个中等国家实施楔子战略,离间它与崛起国的关系。在该体系下,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会促使分化对象做出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而在多极体系下,国家之间保持现状的意愿强烈,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自由度大。除了选边站队,摇摆也成为了分化对象的选择之一。分化对象往往会同与分化者和分化者的敌对国进行正常的经贸往来,而交往程度和交往范围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不一样,影响因素包括威胁认知、领导人决策和国家利益考量等国内因素,这里暂不多赘述。综上,体系类型决定了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自由度。两极体系下,分化对象的选择自由度小,只能二选一;多极体系下,分化对象的选择自由度大,除了二选一,也可采用摇摆的姿态来回应分化者的楔子战略。

### (三) 同盟凝聚力、盟国干预与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

面对分化者的楔子战略,分化对象在需要做出二选一(即接受分化或拒绝分化)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分化对象所处同盟凝聚力的高低影响着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

凝聚力指的是集体或某一社会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因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结为有机整体的某种聚合力。何谓同盟凝聚力?当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来定义同盟凝聚力。第一,从目标角度看,同盟凝聚力是指“盟友在目标、价值

---

① 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 93, No. 3, 1964, pp. 881 ~ 909.

观上达成一致的水平,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sup>①</sup> 第二,从承诺角度看,同盟凝聚力是指“同盟成员国对同盟承诺的趋同程度”。<sup>②</sup> 本文将同盟凝聚力定义为,同盟成员国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在出现战略分歧时协商解决冲突的能力。

具体来说,同盟凝聚力的高低主要受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和威胁一致度影响。同盟成员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威胁感知一致度越高,同盟国解决分歧的需求就越强烈,在面对外部干预时维持原同盟的决心就越大,同盟凝聚力越强;反之,同盟凝聚力越低。除此之外,盟国间的实力对比也会影响同盟凝聚力。盟友之间的权力分配可以被描述为不对称或对称。不对称的权力分配为盟友之间提供了清晰的等级制度。高度不对称性允许占主导地位的行动者抑制较弱盟友的行动空间,从而增强同盟凝聚力。<sup>③</sup> 综上,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和威胁一致度是衡量凝聚力高低的首要指标,实力对比及互动水平可以视作衡量凝聚力高低的参考指标。凝聚力低的同盟可称为松散型同盟,反之为紧密型同盟。

当分化对象处于松散型同盟时,盟国的干预会决定其选择。如前文所言,楔子战略是一个以分化对象为中心的战略。就报偿式楔子而言,无论是在前期的战略制定,还是中后期的战略执行阶段,分化对象的利益需求始终都被放在首位。而当分化者使用强压式楔子时,分化对象与其盟国本就存在的战略分歧会加剧,盟国之间的猜疑和争论可能会逐渐升级。在松散型同盟中,同盟凝聚力水平低,所以在面对楔子战略时,分化对象不会直接拒绝分化,而是会基于利益的考量来重新思考是否维持与原同盟的关系。因此,盟国的干预将决定分化对象的选择。本文中的盟国干预是指在分化对象面对楔子战略时,盟国领导国对此的回应。如果盟国领导国的干预力度强于分化者的楔子力度,分化对象会选择

① Fred Chernoff, “Stability and Alliance Cohesion: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s on Targeting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4, No. 1, 1990, pp. 92 ~ 101; Hyun-Wook Kim and Won K. Paik, “Alliance Cohesion in the Post-cold War US-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23, No. 2, 2009, pp. 1 ~ 40; Noelle Troutman, *Alliance Cohesion: Connecting the Disconnect in Alliance Reliability*,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20, p. 2.

② Sarah Kreps, “Elite Consensus as a Determinant of Alliance Cohesion: Why Public Opinion Hardly Matters for NATO-Led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6, No. 3, 2010, pp. 191 ~ 215.

③ Noelle Troutman, *Alliance Cohesion: Connecting the Disconnect in Alliance Reliability*,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20, p. 7.

维持原同盟关系,反之,背叛原同盟。而衡量盟国的干预力度是否强于楔子力度的关键,主要是看盟国和分化者谁更能满足分化对象的核心利益诉求;从经济层面看,相比分化者,盟国领导国是否能为分化对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经济援助;从安全层面看,相比分化者,盟国领导国是否能为分化对象提供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从政治层面看,相比分化者,盟国领导国是否能为分化对象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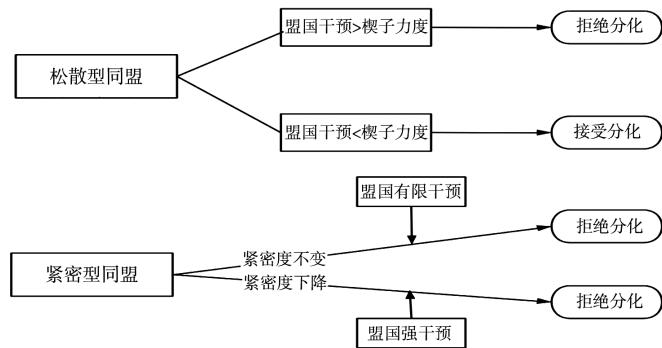


图1 同盟凝聚力对分化对象选择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当分化对象处于紧密型同盟时,面对楔子战略时,分化对象不会选择背叛原同盟。与那些凝聚力较低的同盟相比,高度凝聚的同盟将更有效地聚合他们的资源,并使他们的努力同步,他们也将更有效地作战,因此他们将不太容易被抛弃和推卸责任的联盟病症所影响,也不太容易被对手通过楔子战略而分化。<sup>①</sup>此时,盟国的有限干预就可以使分化对象维持原同盟关系。但当分化者在同盟的紧密性出现下降的趋势时使用楔子战略,则分化对象与盟国的关系将会被极大地削弱,此时就需要盟国强干预。同盟凝聚力的高低不是恒定值,而是变化值。

<sup>①</sup> Evan N. Resnick, “Hang Together or Hang Separately? Evaluating Rival Theories of Wartime Alliance Cohes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4, 2013, pp. 672 ~ 706.

如果联盟内部的利益不再一致,那么这种特殊形式的合作就不再有坚实的基础。<sup>①</sup> 同盟紧密性下降,代表着同盟成员国之间就某种利益和目标无法达成完全一致,此时分化者的楔子战略会加速同盟关系的破裂。国家对其盟友的可靠性的变化很敏感。<sup>②</sup> 如果盟国不进行强干预,分化对象会因此质疑保持原同盟关系的必要性,对盟国的可靠性产生质疑,由此采取行动去减轻风险(见图1)。

#### 四、案例检验

上文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同盟凝聚力和盟国干预力度对分化对象战略选择的影响,为了考察理论分析的适用性,以下用四个案例来予以验证。

##### (一) 俄英法试图分化意大利与德奥同盟(1914~1915)

对于意大利来说,1881年法国对突尼斯的占领使意大利完全孤立,<sup>③</sup>再加之罗马教皇问题所引起的内忧外患,让意大利决定寻求其他欧洲大国的支持并与之结盟。<sup>④</sup> 意大利王国首相桑尼诺写信给外交部长曼奇尼,指示意大利应前往柏林“建立一个牢固而快速的联盟”。<sup>⑤</sup> 对于意大利的结盟意愿,起初德国表现得并不积极,以冷漠的态度回应。俄国泛斯拉夫舆论的沸腾,以及俄法关系的日益密切,让俾斯麦转变了态度。1882年5月20日,德意奥完成了同盟条约。

虽然双方最终成功结盟,但德意奥同盟的凝聚力低,属于松散型同盟。首先,就利益契合度而言,双方结盟的目标并不一致,这导致后续双方难以满足彼此的利益需求。俾斯麦是想通过结盟来保证意大利不与其敌对力量结合,意大利则想要通过此次结盟摆脱暂时孤立的外交处境。其次,就威胁感知而言,双方

① Jan Braathu, “Unilateralism and Alliance Cohesion: The United States, Western Europe, and The Regulation of Energy-related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8, No. 1, 1983, pp. 21~41.

②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4, 2020, pp. 45~83.

③ Luigi Albertini, Isabella M. Massey (Translator),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Enigma Books Press, 2005, p. 40.

④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⑤ 转引自 Luigi Albertini, Isabella M. Massey (Translator),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Enigma Books Press, 2005, p. 41。

也存在着差异。对于德奥来说,俄英法在内的协约国已经对其国家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对意大利而言,来自俄英法的威胁并不足以促使其发动战争。因此,即便签订了同盟条约,德意奥同盟关系也并不紧密,盟国在军事战略上没有达成一致。再加之意大利一直将奥匈帝国视为敌人,<sup>①</sup>三国同盟注定难以紧密化。

俄英法对意大利实施楔子战略,想要以此来分化意大利与德奥同盟。1914年8月2日,德国对俄国宣战的第二天,也是意大利正式宣布中立的前一天,俄国驻意大利外交官萨佐诺夫表示“有必要尽快达成协议并让意大利相信,如果意大利不相应地积极参与(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它就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收益”。<sup>②</sup>处于焦点位置的意大利对俄英法的拉拢并没有拒绝,而是借此提出要求。在一战刚爆发时,桑尼诺就与俄进行了谈判,旨在“收购领土,并保证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地区有更高的地位。”<sup>③</sup>1914年8月14日,意大利外交部长向俄国大使彭斯基发表明确声明:“意大利处于十字路口,摆在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中立或与协约国结盟,但目前我们无法做出决定,公众舆论、军事准备、经济力量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sup>④</sup>为了实现战争的胜利,俄英法也在努力满足意大利的要求,从语言到行动上都有所体现。比如,1914年10月23日,彭斯基给意大利总理萨兰德拉发出电报,提到“俄国皇帝对意大利表示高度同情,愿意释放所有具有意大利国籍的奥地利囚犯,只要意大利保证不会让他们回到奥匈帝国军队。”<sup>⑤</sup>同时,对于意大利提到的领土诉求,俄英法也是以温和的口吻回应。在经济方面,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在意大利的私人投资总额高达四亿四千万里

---

① 转引自 Roy Pryce, “Italy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1, No. 2, 1954, pp. 219 ~ 227。

② Raymond Poincaré,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Neuf Années De Souvenirs*, Plon-Nourrit Et Cie, 1926, p. 507; Du Quenoy, Paul, “With Allies Like These, Who Needs Enemies? Russia and the Problem of Itali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 45, No. 3, 2003, pp. 409 ~ 440.

③ René Albrecht-Carrié,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914 ~ 1922,”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0, No. 4, 1948, pp. 326 ~ 339.

④ Luigi Cadorna, *La Guerra Alla Fronte Italiana Fino All'Arresto Sulla Linea Della Piave e Del Grappa (24 Maggio 1915-9 Novembre 1917)*, Con 3 Carte corografiche, Vol. 2, fratelli Treves, Editori, 1921, pp. 28 ~ 29.

⑤ Mario Toscano, *Il Patto Di Londra Storia Diplomatica Dell'intervento Italiano ( 1914 ~ 1915 )*, Zanichelli, 1934, p. 64.

拉，并且法国还是意大利国债的最大持有国。<sup>①</sup>

面对俄英法的强势拉拢，德奥是有所干预的，但干预力度低于楔子力度。对于意大利来说，由于处于即将爆发战争的紧张局势中，安全问题成为其首要考量因素。因此，在应对双方拉拢的情况下，意大利最关心的是谁能为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主要体现为支持意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建立战略支点。在第一次向俄国提出领土诉求时，意大利就明确表示要确保其在亚得里亚海的主导地位。<sup>②</sup>对于意大利的此项要求，德国始终无法满足。而俄英法最终同意了意大利的此项核心领土诉求，最终于1915年4月26日秘密签订《伦敦条约》。通过《伦敦条约》，意大利通过吞并达尔马提亚和瓦洛纳的北半部以及一些腹地，在亚得里亚海海域占据主导地位。<sup>③</sup>

综上，意大利与德奥同盟的凝聚力低，这就导致在面对分化者的报偿式楔子时，盟国的干预将直接影响分化对象的选择。相比于俄英法，德奥无法满足意大利的核心利益诉求，最终，意大利选择接受分化，离开原同盟。

## (二) 英国试图阻止意大利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1936~1939)

1936年10月23日，德意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两国正式结成了政治同盟关系。虽然在协议<sup>④</sup>中双方都表达了友好的意图，但此同盟凝聚力低。第一，双方结盟的战略目标完全不同。对于意大利而言，成为地中海上的强国一直是它的主要战略目标，而英法等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态度让它意识到外交层面的孤立。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发生后，法国决定对意

---

① Wolfram W. Gottlieb, *Studies in Secret Diplomac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21. p.225.

② Mario Toscano, *Il Patto Di Londra Storia Diplomatica Dell'intervento Italiano ( 1914 ~ 1915 )*, Zanichelli, 1934, p. 80.

③ René Albrecht-Carrié,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914 ~ 1922,”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0, No. 4, 1948, pp. 326 ~ 339.

④ Maximiliane Rieder, *Deutsch-italienisch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Kontinuitäten und Brüche 1936 ~ 1957*, Frankfurt: Campus Verlay, 2003.

意大利实施禁运政策,<sup>①</sup>英国将意大利的此次入侵行为视作是纯粹的侵略。<sup>②</sup>虽然在这之后,英国为了保证地中海的和平状态,努力劝说法国放弃对意大利的制裁。但在墨索里尼看来,法国对意的制裁是一种背叛,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无法与英法达成一致。<sup>③</sup>此背景下,墨索里尼别无选择,只能与纳粹德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发动战争以实现征服欧洲的计划是他唯一的目标。为了尽可能延长德国的军事准备时间,与意大利的结盟计划可以作为向英国施压的工具。<sup>④</sup>第二,在威胁感知层面,双方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德国希望意大利切断与英国的联系,完全服务于德国,意大利则一直试图与英国保持联系。第三,从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后的互动来看,双方之间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无法有效推进合作关系。比如,在发动战争方面,意大利因为缺乏与西方国家较量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一直在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问题上犹豫不决。<sup>⑤</sup>而在德国看来,意大利的回避行为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尽管在官方宣传中,德国试图塑造出一种德意之间钢铁般的友好形象,但实质上,双方对共同威胁和利益的评估标准不同,且误解猜疑不断,同盟关系不牢固,属于松散型同盟。面对英国的拉拢,意大利也并没有明确拒绝,反而利用焦点位置的优势,索要更多的利益。

英国对意大利实施楔子战略,试图阻止德意从松散的政治同盟发展为紧密的军事同盟。早在德意1936年签订协议之前,英国就在拉拢意大利。1935年4月,英法与意大利在斯特莱莎召开会议,建成了所谓一致对德的斯特莱莎阵线。

① Martin Thomas, *Britain, France and Appeasement: 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Popular Front Era*,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1996, pp. 55~58; William I. Shorrock, *From Ally to Enemy: The Enigma of Fascist Italy in French Diplomacy, 1920~1940*,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81~186.

② Jens Peterson, *Hitler, Mussolini: Die Entstehung der Achse Berlin-Rom 1933~1936*, Tübingen: Niemeyer, 1973; Michael Ceadel, "The First British Referendum: The Peace Ballot, 1934~5,"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377, 1980, pp. 810~839.

③ Christian Goeschel, *Mussolini and Hitler: The Forging of the Fascist Alli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96.

④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Penguin Book, 2007.

⑤ Christian Goeschel, *Mussolini and Hitler: The Forging of the Fascist Alli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96.

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英国并没有对意大利使用武力,反而努力劝说法国放弃对意的制裁。对此,英国方面的理由是:我们的希望在于维持一个和平的地中海,而这只有通过恢复与意大利的友好关系才能实现。<sup>①</sup> 1936年11月,墨索里尼在一次庆祝罗马—柏林轴心国成立的演讲中,间接表达了对英意协约的兴趣,英国积极回应。英意两国在1937年1月签署了一份名为《绅士协议》的声明,承认共同但不冲突的地中海利益和对地中海现状的相互承诺。<sup>②</sup> 为了保证意大利的中立,英国还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对意大利做出了重大的让步。1938年4月,英意签订《英意复活节协议》,其中英国承诺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以换取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全部撤走其在西的“志愿军”。<sup>③</sup>

同时,德国在与意大利签署政治同盟协议后,也没有放弃对意大利的示好。德国积极拉拢意大利,想要结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1937年纳粹德国的政军领袖赫尔曼·威廉·戈林访问意大利时表示“德国将承认南蒂罗尔为意大利的一部分。”<sup>④</sup> 对于德国来说,在被英国拒绝后,意大利是其唯一的潜在盟友,希特勒只能选择与墨索里尼结盟。在此背景下,德国必须进行强干预,才可能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

德国的强干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安全层面,德国成功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让意大利看到了成为地中海强国的希望。1938年9月,英法德意召开慕尼黑会议,在会议上四国首脑达成共识,允许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德国吞并与法国结盟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削弱法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影响力,并增加意大利在东南欧的影响力。<sup>⑤</sup> 第二,在经济层面,意大利的煤炭严重依赖于从德国的进口,这使墨索里尼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导

① 转引自 Robert Boyce and Esmonde M. Robertson, *Paths to War: New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 199。

② Christian Goeschel, *Mussolini and Hitler: The Forging of the Fascist Alli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9.

③ Donald Cameron Watt, “Gli Accordi Mediterranea Anglo- italiane Del 16 Aprile 1938,” *Rivista di Studi Politici Internazionale*, Vol. 26, No. 1, 1959, pp. 51 ~ 76.

④ Christian Goeschel, *Mussolini and Hitler: The Forging of the Fascist Alli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30.

⑤ Ibid., p. 131.

致国际联盟实施制裁之前,意大利的大部分煤炭都是从英国进口的,但到1937年,意大利从德国进口的煤炭已上升到其总进口量的60.7%。<sup>①</sup>第三,在国家领导人层面,希特勒积极发展与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私人关系。1936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以私人身份向彼此发出生日祝贺电报。此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后到对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并以最高礼节迎接彼此。在墨索里尼访问德国期间,希特勒通过举办大规模的民众欢迎仪式向其炫耀德国的实力和民众的团结,以争取意大利加入德国的军事同盟。<sup>②</sup>虽然意大利的一些政府官员和民众对与德结盟持怀疑态度,但作为意大利的最高统帅,墨索里尼主导着意大利的政局,并一直助推与德结盟。

综上,与分化者英国相比,德国更能够满足意大利的核心利益诉求,意大利最终选择了德国。

### (三)苏联试图分化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1954~1956)

1951年9月8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美日同盟正式建立。虽然美日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就如前文所言,不能简单地以实力对比的标准就将这一时期的美日同盟视作紧密型同盟。事实上,从1951年到1956年,这一时期美日同盟凝聚力低,日本对美国缺乏信任,双方的结盟关系属于松散型同盟。在这一时期,由于多种事件的影响,美日同盟的凝聚力还一直在降低,直到1957年岸信介当选日本首相后,美日关系才迎来新的转折点。

影响美日同盟凝聚力的事件主要有两起,分别是1954年的日本渔民死亡事件和鸠山一郎宣布新外交政策。1954年美国核试验的沉降物导致一名日本渔民死亡。事件发生后,美国并没有给日本支付高额的赔偿,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美国官员还试图隐瞒信息,推卸责任。<sup>③</sup>事件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为了能在核竞争中赢得苏联,也不顾日本国内的反对,仍然继续核试验。《旧金山和平条约》的

① Maximiliane Rieder, *Deutsch-italienisch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Kontinuitäten und Brüche 1936~1957*,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003, p.133.

② Christian Goeschel, *Mussolini and Hitler: The Forging of the Fascist Alli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83.

③ Martha Smith-Norris, "Only as Dust in the Face of the Wind: An Analysis of the BRAVO Nuclear Incident in the Pacific, 195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6, No. 1, 1997, pp. 1~34.

不平等性质本就引起了日本国内对美国的极端不信任,此次事件无疑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同年12月,鸠山一郎当选日本首相,并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对于战后日本来说,最紧迫的目标是重返国际社会,但美国基于本国利益考量以强压式的手段来阻挡日本与苏联和中国改善关系。在此背景下,鸠山一郎的“自主外交”政策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官员也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政策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美日联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记录了日本“逐渐的中立主义”和“脱离”同盟的趋势。<sup>①</sup>

苏联在意识到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后,决定对日本实行楔子战略,分化美日同盟。首先,苏联向日本积极释放友好信号。1952年1月1日,应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请求,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破天荒地通过苏联驻日本代表团向日本国民发表了新年贺词。对于斯大林向日本国民发表新年贺词,日本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苏联向日本转达的希望改善日苏关系的重要信号。<sup>②</sup>此后,苏联领导层通过官方演讲等形式,间接地向日本表达合作意愿。1953年8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时,首次公开表示苏联愿意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提出“鉴于朝鲜停战协定的缔结,当前迫切的任务是恢复远东各国间的正常关系,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sup>③</sup>鸠山一郎宣布实行新的“自主外交”政策更是为苏联实行楔子战略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苏日两国的交流增多。1955年1月7日,苏联驻东京的外交官安德烈·多姆尼茨基在非正式场合会见了鸠山,向他介绍了苏联关于开始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建议。<sup>④</sup>其次,苏联并不强迫日本接受共产主义,尊重日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1955年1月25日,多姆尼茨基与鸠山一郎见面,鸠山一郎

<sup>①</sup> 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A History of U. S. -Japan Rel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 314; 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4.

<sup>②</sup> 张千任:《鸠山一郎内阁“自主外交”政策研究》,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12月,第62页。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109-01922-02,驻苏使馆编纂苏联近况(3)》第6章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958年12月25日。

<sup>④</sup> Yasuhiro Izumikawa, “Binding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Soviet-Japanese-US Diplomatic Tug of War in the Mid ~ 1950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2018, pp. 108 ~ 120.

开门见山地表示“不喜欢共产主义”，多姆尼茨基表示“十分了解你不喜欢共产主义。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意识形态强加于对方以谋求两国邦交的正常化”。<sup>①</sup> 再次，苏联承诺归还日本战俘，并在领土方面对日做出最大让步。在 1955 年 6 月苏日双方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中，苏联对日本的领土归还要求是拒绝的态度。但为了拉拢日本，苏联最终还是做出了领土方面的妥协。8 月 9 日，苏联外交家马利克表示，苏联愿意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归还给日本。<sup>②</sup> 土地是构成国家的要素之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做出领土方面的妥协都是十分困难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苏联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日本的要求。

面对美日同盟的不稳定状态以及苏联对日本的强势拉拢，美国采取了强干预手段来阻止日本向苏联偏移。二战后，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盟国，也是美苏之间竞争的关键场所之一。对美国来说，必须制止日苏关系朝着友好的方向发展。起初，美国是同意日苏之间的正常交往的，但认为也必须给日本施加压力，以使其变得困难，并防止未来更严重的威胁——中日正常化。<sup>③</sup> 但随着苏联对日本楔子战略的力度逐渐加大，美国的干预力度也在加强。在报偿方面，1953 年 6 月，艾森豪威尔就决定将奄美群岛转交给日本，在得知了苏日之间的接触后，艾森豪威尔指示要加快归还的速度。12 月 24 日，美日签署了《关于奄美群岛美日两国协议书》，美国将与论岛以北的奄美群岛转交日本。<sup>④</sup> 同时，美国也在思考是否要改变原先的对日强压措施。1955 年 4 月，美国政府通过了新的对日政策基本文件。文件规定“美国应避免向日本施压，不应要求其增加军事力量，以致损害政治和经济稳定”。<sup>⑤</sup> 美国并不是一味地以奖励的方式去拉拢日本，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当美国意识到报偿性干预对美日关系的加深

① [日]鸠山一郎，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译：《鸠山一郎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97 页。

② Takahiko Tanaka, *Nisso Kokko Kaifuku No Shiteki Kenkyū: Sengo Nisso Kankei No Kiten, 1945 ~ 1956*, Tokyo: Yuhikaku Press, 1993.

③ Takahiko Tanaka, “The Soviet-Japanese Normalization in 1955-6 and US-Japanese Relations,”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Vol. 21, 1993, pp. 65 ~ 93.

④ Yasuhiro Izumikawa, “Binding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Soviet-Japanese-US Diplomatic Tug of War in the Mid-1950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2018, pp. 108 ~ 120.

⑤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 S. Policy Toward Jap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d28>.

无法提供更直接的影响后,便决定以适度的威胁来拉拢日本。在威胁方面,美国威胁日本,如果其向苏联妥协,那么美国将会宣布对冲绳保有完全主权。<sup>①</sup>

在当时的日本政界,日本官员在对苏外交政策方面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美国的领土归还等干预措施拉进了美日之间的距离,美国的威胁措施也让日本政界的亲美派势力加大对鸠山一郎的批评。最终,1956年12月20日,鸠山一郎辞职,苏联的楔子战略以失败告终。

#### (四) 美国调整对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20世纪50年代后期)

如前文所言,同盟凝聚力的高低是一个变化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同盟就是最佳的例证。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同盟关系正式建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与苏联结盟是为了保障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对苏联而言,与中国结盟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sup>②</sup> 双方的根本目标不一致,从签约之前的多轮谈判中也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益冲突,此时的中苏同盟凝聚力低。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中苏同盟迎来了蜜月期,但1959年中印边境事件又成为了中苏关系恶化的起点<sup>③</sup>。从1953年到1959年,这一时期的中苏同盟凝聚力高,苏联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中国对苏联提供政治支持,双方互补性强,双边关系不断增强。

但在此期间,一些事件的发生仍然影响了中苏稳定的同盟关系,加剧了两国间的不信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面批评斯大林,毛泽东对此是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肯定的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神话的打破,但毛泽东也否定了赫鲁晓夫在具体内容和方法上的失当之处。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支持,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这些都增进了中苏两国的关系。但在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国的分歧彻底暴露。苏共认为,战后的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

<sup>①</sup> Yasuhiro Izumikawa, “Binding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Soviet-Japanese-US Diplomatic Tug of War in the Mid-1950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2018, pp. 108 ~ 120.

<sup>②</sup>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

<sup>③</sup> 同上,第368页。

变化而改变,战胜帝国主义靠的是已经显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战争;中共则认为,目前整个世界仍然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因此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手段必然是革命和战争。<sup>①</sup>此次事件后,中苏同盟的凝聚力开始下滑。赫鲁晓夫提出的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触及到了中国的主权,中苏关系更趋紧张。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种种事件的发生一步步暴露和凸显了中苏的分歧,并严重威胁到了中苏的同盟关系。综上,1956年到1959年期间,中苏同盟凝聚力高,但是其中也发生过导致两国同盟紧密程度下滑的事件,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调整了对中苏的楔子战略。

当美国感知到中苏同盟的微妙变化后,决定调整楔子战略,将苏联定位为分化对象国,诱使苏联摆脱中国。1955年6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亚洲研究教授兼心理战专家林白乐首次提出了这种以苏联为分化对象的新型楔子战略。林白乐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中国对“外国西方人(如‘白人’)之间以牺牲他们为代价的交易”的恐惧,将美苏协议塑造成一种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问题的形象,从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制造偏执狂,进而削弱他们对苏联的信心。”<sup>②</sup>基于第一次楔子战略的失败,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从1956年到1959年,每当中苏出现摩擦时,美国就会找准时机,一边对苏联进行拉拢,一边对中国实行高压政策。例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这让美国察觉到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并决定采取手段扩大这一分歧。一方面,美国官员公开发表了支持苏联而非中国的声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公开称赞赫鲁晓夫的做法,称之为苏联的“新面貌”。<sup>③</sup>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谴责。1960年,美国对分化中苏同盟的信心增强,美国政界越来越意识到中苏两国的争端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分化中苏的楔子力度加强。比如,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方面,美国明知在当时的战

①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页。

②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2.

③ Ibid. , p. 158.

略环境下中国对该条约的态度，仍然努力寻求与苏签约。从中苏争端的角度来看，美国此番行动与其说是为了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不如说是为了加剧中苏之间的不和，同时通过招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核计划的谴责来更加孤立中国。<sup>①</sup>

对于中国来说，苏联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盟友国，所以当中苏出现摩擦时，中国也在努力维护中苏之间的关系。当赫鲁晓夫的言论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应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此仍然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在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努力维护苏共的威望，当中苏之间出现分歧意见时，中国领导人也以求同存异的方式进行解决。但苏联在长波电台、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中的态度和举动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已不愿为了维持同盟关系而妥协退让，对美国的楔子战略采取的干预措施有限。最终，中苏同盟彻底破裂。

综上，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方面的不一致有直接关系，但也不可低估美国的楔子战略起到的加速作用。每当中苏同盟出现摩擦时，美国都会加大对苏联的楔子力度，对苏联“煽风点火”。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时，中国无法通过妥协和退让的方式进行强硬干预，这也影响了苏联对于维持原同盟关系的态度。

## 五、结语

在国际关系史中，楔子战略一直被国家用来分化和瓦解敌对同盟。时至今日，它也依然是一些国家破坏敌对同盟关系的首要选项。作为楔子战略的熟练使用国，近年来美国多次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打入“楔子”，挤压中国战略环境。比如，近年来，美国加强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的防务联系，意图恶化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美国除了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打入楔子，还试图离间中俄关系。2022 年 6 月 3 日，美国智库海军分析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名为《对抗

---

<sup>①</sup> Yifan Song,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44 ~ 1963*, Thesis,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 2018, p. 82.

中俄同盟的楔子战略》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克劳福德提出“美国应该利用“选择性调适”的楔子战略对俄罗斯在重要安全利益方面进行让步,从而使其疏远中国。<sup>①</sup> 面对美国的楔子战略,中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第一,就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一定要主动出击,时刻关注美国楔子战略的动向,并进行经济方面的强干预。当前,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它们最迫切的需求。中国是东南亚国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再加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邻近的地理优势,这些都是美国不可比拟的。为此,中国应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同时一定要找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痛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经济投资,来以此反制美国的楔子。第二,就俄罗斯而言,中国要保持和俄罗斯的高层会晤,防止双方出现战略误判和误解。1992 年以来,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步入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俄两国的合作机制逐渐成熟,双方的战略互信在不断强化。但任何国家之间都不可能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与摩擦,为此中国要时刻保持警惕。当俄罗斯对中国有误解时,一定要及时的通过交流合作来化解分歧,切不可给美国打入“楔子”的可乘之机。第三,中国一定要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来对抗美国的楔子战略。从上文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化对象国往往利用“焦点”位置来增加其议价水平,反复横跳在中美两国之间。为此,中国在进行干预时,切不可为了对抗美国的楔子,对分化对象国的要求毫无原则的退让。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对楔子战略的研究都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楔子战略下分化对象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不足。第一,在理论变量上,对同盟凝聚力的高低判断还有待再细化。第二,在案例方面,在楔子战略的研究中,过程追踪法是最佳的研究方法,但基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案例的因果机制阐述方面的深度依然有限。未来,希望加深对此的探讨和进一步的研究。

---

<sup>①</sup> “Countering Chinese and Russian Alliance Wedge Strategies,” <https://www.cna.org/reports/2022/06/Countering-chinese-and-Russian-Alliance-Wedge-Strategies.pdf>.